

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，打破了我正常生活的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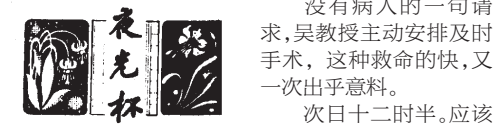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右大腿根部，有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伤口，时结痂，时脱落，一年余，未重视。但皮肤伤口长期不能愈合总不正常。终于去了皮肤科闻名的某三甲医院

就诊。不料，普通门诊的年轻女医生见患处并问诊，立即诊断为 paget 病，是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。此病易与湿疹混淆，常被老年患者忽视，耽误了治疗时间。医生立即让我去活检登记。

怎么办?多方打听，就诊医院的皮肤科吴教授，是有名的擅长皮肤良恶性肿瘤手术的专家。网上预约，额满。两周后再约，恐怕也难。面对突然来袭的凶恶疾病，心急如焚。

正在走投无路之时，经朋友指点，去某区中心医院，它是该三甲医院的分院，吴教授在那里有每周一次的特需门诊。能否加号?可一试试。意想不到，加号竟如此顺利。当我接过护士手中可以挂号的加号小纸时，手抖得厉害。

一间皮肤科诊室被隔



改革开放 40 年，上海商业的变化是巨大的，这些变化是商业条线的干部、职工“积跬步而至千里”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，是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头拱旧体制的“天花板”，破土而出形成的。这里讲讲饭店第一次装“空调”的故事。

老上海人都晓得，过去“三伏天”到饭店吃饭，都要争有电风扇的桌子，因为那时没有空调。一顿饭吃完，汗流浹背。饮食行业到夏令时段，营业额必然下降，如新雅粤菜馆 1978 年 6 月份营业额比 5 月份下降 20%。同年 7 月份，市饮食服务公司决定在本市新雅、梅龙镇、老饭店、美心、红房子等五户特色饮食店，安装空调开放冷气。考虑到开冷气需要耗电，打报告给市物价局请求同意菜价上涨 20%，市物价局怀疑菜价上涨，是否有食客上门。

1978 年 7 月 14 日，这五家特色饮食店第一天开放冷气，结果闻讯而来的食客挤满店堂。新雅粤菜馆临时只能在二楼会客室增加四只方桌，在三楼东厅增设 11 只圆台面，全部坐满，还有立在桌边等候换桌的。新雅粤菜馆当天营业额增加了 1.2 倍，大伏天有几天营业额单日超万元（当时工资低，普遍四五十元/月，口号是“争当万元户”），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的。开放冷气后，消费对象起了变化，小吃宴请的多了，男女青年约会多了，讲究情调氛围的多了。不少食客反映，多付一点钱，吃得舒服，优雅，值！由于饭店天天食客盈门，有的食客怕吃不上，居然提前两小时来饭店占位。

这五家特色店试点成功后，各区立即推广到其他饭店和其他行业。如照相馆，照相馆的摄影间由于灯光聚集，当时又没有冷光源的灯，夏季因此室温极高，要达到 45℃ 左右，以致顾客很少，经常是“白板”（无客源上门）。主管部门市商业二局也在照相特级户王开、中国、人民照相馆和一级户上海照相馆等安装空调设备，在向市物价局打报告申请照相费用适当涨价时，还考虑到照相服务不同于饮食业，拍照时间短，收费不宜过高，拟按营业额的 10% 收取冷气费。

可见，当时商业服务业还是很为消费者考虑的，包括理发行业装空调，许多女同胞记得，在理发店头发做好发好，座位上留下的是汗渍。但空调装好后，进理发店修饰就是一种享受了。大家记住：1978 年 7 月 14 日，是上海商业服务业开始走上现代化，市民享受商业服务的第一天。以后，上海商业设施陆续改造装上空调，甚至出现一些大商厦门口，附近居民成群结队，借商厦空调的“余荫”乘风凉，当时居民家有空调的人家寥若晨星。

是中午休息的时间。我已躺在手术台上，护士开始在患处进行消毒和局部麻醉。手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。吴教授不停地轻声问，痛不痛?痛，不要忍，告诉我。偶尔有几次可忍的刺痛，病变及可能病变的皮肤很快被切除。护士在切开的伤口上，封盖一块大纱布，让我到手术室外的沙发上休息。

一会儿病理报告出来，无肿瘤累及。吴教授为我缝合皮肤。手术是在我与他的交谈中进行。

我说，现在医生实在太辛苦了。他说，习惯了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喜欢医生的职业。他还希望读高二的女儿，高中毕业考国内的医科大学。也成为像他一样的医生。作为父亲，像所有的家长一样，为孩子能否录取而担心。他知我是退休老师，我们还谈了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学生的过重负担，师生间值得回味的纯真感情等。很少遇到这样平易近人的专家，医患之间可以像朋友一样交谈。

两周后拆线，我得救了。病魔无情人有情。吴教授以最快的速度，非常顺利地为我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。他以精湛的医术、高尚的医德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。

我多么希望更多的医生像吴教授那样，在喜欢的生活中，共同书写一页又一页，满满地写着绝望者的希望，痛苦者的解脱，重生者的感恩……

老家武康有一种很不起眼的萱草花，长在堂前屋后、小桥河边。橘黄色的花瓣，温婉恬静，花开时节，会散发淡淡的清香。诗人孟郊有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的诗句。萱草花又名萱苏、谖草，《说文》记载为忘忧草，《本草纲目》名曰疗愁，老家称为母亲花。

家乡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。许多乡以前，有一位少女将远嫁北方。离开家乡时，母亲交给女儿一包萱草花种，嘱咐女儿到了千里塞外，把它撒在山岗上，等到满山遍野萱草花开，你就会见到娘了。从此，骨肉离散，天各一方。萱草花开，年复一年，母亲怀抱萱草花，依偎在胸前，直至终老。女儿在开满萱草花的山岗上，眺望家乡，思念母亲，望眼欲穿，最后客死他乡……

凄美的故事令人伤感，感人的诗文世代流传。孟郊的千古绝唱“谁言寸草

中国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，在怎样的苦难里都活过来了。在怎样卑贱困苦的境地里都不倒下去，都默默地忍受着一切，沉默地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。

抗战结束了，可是跟随着那一场战争所牵连出来的颠沛流离到今天还没有完。

我是个在抗战最后的末期才出生的人，所以，整个战争的阴影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。但是，“覆巢之下无完卵”，像我今天这种奇怪的命运也是因着这场浩劫而形成的。

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竟然可以是我的故乡，所有的认识也不过只是父母所告诉我的一个名字而已。三十多年的乡愁只有在候鸟鸣空而过的时候心中才觉得刺痛，因为我已是一棵移植的树，深植在温暖的南国。

一座从广西走到广东的井

我知道广西有个罗城县，仫佬族聚居的地方。不知道广东电白庄垌村却有座罗城井。更不知道，为什么这里有座罗城井。幸好井边的古碑知道。

明代弘治年间，庄垌人黄廷圭在罗城当了五年知县。1499 年，黄母病逝离任归里守孝，“罗城士民数百泣送，并赠金千两，但黄坚决不受”。于是罗城人“凿石栏井口，相率百余人，自罗运电，不惮远涉之劳，在庄垌就乡居之旁，掘地及泉，砌成一井，名罗城井”。

这一天，我站在罗城井边，望着井水思念。

我不知道五年间他在罗城做了多少好事，才被人称作“黄天平”。

不知道这一百罗城人，轮番扛着这石栏井口，如何餐风宿露，跋山涉水，才走过了两千里路云和月。更不知道要有多深的感恩之心，才能催生如此震天撼地的举动。

幸好这座 500 多年前的老井知道。人心似水，罗城井就是一片明镜。告诉着——有的人，隔着千里万里，也会有人追捧。隔着百年千年，也会被人想念。

心，报得三春晖”的“寸草心”就是萱草花。除此之外，历代文人墨客也为萱草写下了无数名篇佳句。

我经常 would 会想，老家的萱草花之所以年年不衰，就是因为人们对所爱之人的思念不绝，每每看到萱草花，就会思念远在家乡年迈的母亲。有一天，路过一家花卉店，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一盆盛开的萱草花，盆间插有一枝花签，上面书有一行诗句：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”诗经“花”意出自《诗经》。我爱不释手，当即买下。

夜深人静，我在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读到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，使我心痾。”朱熹注释道：“谖草，萱草，忘忧。背，北堂，母亲住所。”到哪里去找来一支萱草，种在北堂前好忘却了忧愁呢？阳台上的萱草花静静无语，淡淡的月光使人感怀，“萱萱寸心草，相思各一方。谖谖不忘忧，何日种北堂？”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纯金的心

——《山里山外》读后感

唐慕蓉

心里不是没有想说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埋藏着的故事，但是如果不能把它们用最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，不如还是继续埋藏起来的好。

读了王鼎钧的《山里山外》，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作“一个时代的见证”。我想，用整个心灵整个生命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在几千万几万万活过来的人中间，总会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写的吧，总会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写下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的遭遇，所有的欢乐与痛苦的吧。

如果我是那些不能写的中国人中间的一个，那么，就让我好好地

认识一位八零后小妈妈

有一次在小区里相遇，她说，奇怪哦，我妈原先一口地道的上海话，最近发现她同我儿子讲话时，一歇歇上海话；一歇歇普通话；一歇歇又上海话夹普通话，听着竟是三不像，合成下来便是一口塑料上海话了。

听她这么一说，着实令人忍俊不禁，上海人喜欢用花来装饰家里，如果是鲜花就称之为“真花”，若是其他材质的，诸如绢、塑料之类的，则通称之为“假花”。记得二十几年前的上海，一般工薪阶层采用塑料花为家里增姿添彩还是蛮普遍的现象，小妈妈用塑料上海话来比喻是再形象不过了。

但若仔细想想，塑料上海话而今就像一件衣裳上的细针密线，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密密麻麻地缝制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了。特别是在公共场所，我已经习惯于先用普通话“打探”，交流中听出对方有沪语口音，再顺溜溜地说上海话。但偶尔也有忘了的时候，有一次去银行办理事务，脱口就讲了上海话，柜台小姐并不动作，只是抬眼看着我，保持微笑。我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不用提醒，连忙改说普通话，果然她即刻麻利地为我办妥了。

朋友在一家公司上班，寻他有事，去他办公室坐了一会儿，我讲沪语，他讲普通话，语调不一致，说话就特别扭。但见他坚持在说普通话，也只能是随着他的调，一同讲。心下却嘀咕着，明明是上海人为啥不讲上海话。出了门他送我，马上说起了上海话，并解释道，办公室里有不少外地人，他们大都听不懂上海话，如果我们自顾自地讲，似乎有些些不尊重他们。看他那么顾及他人的感受，便窃想，沪语退化的原因之一，大概还包含着像他这样的上海“绅士”精神。

如今的上海，你会不会说上海话并不打紧，若不会说普通话那才叫有语言障碍。上次我妹妹回沪，拽上我一同逛城隍庙。她想买一把紫砂壶，走进一家小店，寻觅一番，没她想要的那种造型，又不死心，便向店主详细描述着，不料店主不耐烦地打断道，你说些什么我听不懂，请讲普通话好不好。我看妹妹一下子愣怔住了，她在日本居住了 30 年，除了日语和沪语，估计普通话只有听的份了。见她嘴唇翕动着就是说不出来，一旁的我忙为她解围当起了翻译，店主又从橱柜里拿出了几把壶，其中有一把正是她中意的。虽说是抱得心仪的壶而归，却多少扫了兴致，她无难过地说，怎么回到上海反倒是语言不通了呢？

好在下午我俩去“老锦江”约了几位朋友喝咖啡，她很快扳回一局。咖啡厅里悠扬的钢琴演奏伴着

客人们的浅笑低语，我们几个正说着话，其中一位“老克勒”爷叔对我妹妹称赞道，你们讲得最地道、最漂亮！妹妹听着，脸上又笑成一朵花。

难道我们讲得不地道?都是老上海哦，我们几个有些不服。老克勒委婉地说，你们当然也讲得好，但与她相比，你们的沪语里掺杂了“外来语”，不如她来得纯，她讲的可是一口老式上海话。听老克勒如此评价，我们几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禁哑然失笑，不知不觉，在我们与时俱进的上海话里都已渗透了“塑料”元素。

说笑之余，不免有些许惆怅，曾经充满街头巷尾的“上海闲话”，已然成为记忆中的一道风景了。

去过我的日子，把我的故事留下来，等着有一天有一支笔会重新将我提起，重新把我从那已经远去的年月里再现出来。

如果，如果我是那些可以写的中国人中间的一个，那么，我更要好好地去过我的日子，不管会遭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者怎样的误解，我都要把它们看成是长路上必经的锻炼，我要努力去面对生活，努力让自己也终于可以保有着一颗像金子一样的心。

中国人的遭遇在等待着中国人来写，只有中国人才能明白每一颗逆来顺受的心灵里的光芒与烈火。

我想，王鼎钧先生在写“中国人三书”的时候，必定也是有着这样的心情与信心的吧。

我向这样的一支笔致我最深的敬意。

笔致我最深的敬意。

塑料上海话

周珂银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塑料上海话

